

参政手记

黄 济 人 著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参政手记/黄济人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3003-2

I. 参… II. 黄…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705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07千字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8001—14000册 定价:15.00元

一级、两级、三级……

当我平生第一次从天安门广场径直朝着人民大会堂的东门拾级而上的时候，禁不住两眼泪下，全神贯注地在心里数着那一级级熟悉而陌生的台阶。我想，我是下意识的。我只不过通过这种幼稚的好奇举动，来表达自己的对一座神圣的殿堂心仪已久的感情。

我是一九八八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据这届大会新闻发言人曾涛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所说，总数接近三千的人大代表中，工农代表 684 名，知识分子代表 697 名，干部代表 733 名，解放军代表 267 名……我既非军人、干部，也非工人、农民，我是一个无党派人士，我所在的单位是重庆市文联，所从事的职业是专业文学创作，所担任的最高的社会职务是重庆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所以，我想，我大概归属知识分子代表吧。

然而，倘若没有人告诉我，我却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如何当选的。那年元旦刚过，我在成都参加四川省政治协商会议，我所在的界别（共青团、工会、妇联）小组召集人，是担任着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和四川省青年联合会主席的黄女士。她既是省政协委员，又是省人大代表，所以稍后两天当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也召开的时候，她需要两头跑会。一日，黄女士刚从人大会上回来，

便把我从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拉了出去：

“你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哩！”她站在楼梯过道上，用一种惊喜的口吻说，“今天上午人代会印发了四川的两百多位候选人名单，嗯，这是机密材料，会后要收回的，所以我不能带来给你看，但，你尽可放心好啦，重庆方面推荐提名的，肯定少不了你！”

我一时愣怔住了。眼睁睁地望着黄女士推门进屋，自己却怎么也挪不动腿。我不存在放心与不放心的问题，于我而言，事情完全是突发的，无所谓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唯有感觉，便是一股强大的暖流在包围着我，在蒸腾着我，而我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头上正顶着一轮火红的太阳。又一日，也就是省人大会完成了所有选举任务的那个下午，行色匆匆的黄女士再一次把我拉到会议室外边的楼梯过道上。

“你们单位是怎么搞起的？莫非你得罪了什么人不成——”黄女士这次脸色颇有异样，口吻更是大相径庭。“跟你说嘛，你们单位推荐了两个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梁上泉。梁上泉的推荐材料写得才好哟：全国著名诗人，诗集出了好几十本，所以他以高额票数当选了；可是你呢？材料上写的是重庆市文联《红岩》编辑部编辑，出的书也只是一本《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送给我的书中，不是还有另外三本《崩溃》、《征夫泪》和《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吗？唉唉，你看这事情搞的……”

在黄女士的长吁短叹中，我已经做好了落选的精神准备。人非木石，我倒不是那种真正沉得住气的人，我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对单位对领导的充分的信赖上的，就是说，我不曾得罪过什么人，什么人也不曾修理过我。因为退回去两三年，我确乎只是一

个编辑而不是一个作家呀，那个时候，我确乎只有一本书而没有四本书呀。况且，推荐材料上即便按照眼前的情况写了，就其影响、成就以及知名度而言，我与梁上泉也确乎不在一个档次上的。曾记否，当年他的《红云崖》唱遍神州大地的时候，我还是石头城下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儿哩！

黄女士又说话了：

“嗯嗯，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当选了。只不过……只不过按照得票多少为序，你成了四川两百多个当选代表中的最后一名……”

乍暖还寒，亦悲亦喜。从黄女士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中，我虽然为自己缺乏竞争力而羞愧难当，甚至为殃及朋友与青年联合会的脸面而无地自容，但，我唯一能摆脱尴尬与窘境的理由，竟和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发生了联系。那就是，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采用的都是等额选举，而到了第七届，我们这一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中，终于有首次差额选举的实施。生逢其时，躬逢其事，宁做凤尾，不做鸡头，我应该感到自信与骄傲才是！这样想时，头顶上的太阳虽然落坡了，然而有一轮皓月却钻出云层，光如水泻，柔如雪飘，挂在我的眼帘上的，是满世界的清亮，满世界的透明……

从成都参加完四川省政治协商会议返回重庆不几天，我收到了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秘书处寄来的用大红颜色印制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选通知书》：“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你为四川省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资格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后确认。”确认之前，我却需要到广州去，为花城出版社修改一部已通过他们初审的书稿。就在改稿期间，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四日，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

条上看见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台湾省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方案的决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等 31 个选举单位分别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 2970 名代表的资格有效，现将名单予以公布。

代表名单是以新华社的名义在同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占了整整一个半版面。当我在四川省 203 名代表中找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先前的一种惴惴不安竟顿时变作了此间的另一种惴惴不安。不是么，我的名字先后两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一次是关于拙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出版的消息，一次便是这份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在我的理念中，这两次是构成了因果关系的，而其间存在的问题是，前一次倘若可以算作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话，那么后一次，则是无功受禄、不劳而获呀！而且，始所未料的是，后一次比前一次更能够影响我的平静的生活，几乎从正式当选为全国人大代

表的那一天开始。

那一天，我收到重庆市文联党组王书记以他个人名义拍来的电报，“祝贺你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请速离穗返渝，准备赴京开会”；那一天，我的责任编辑带来一位“健力宝”集团公司的部门经理张先生，张先生代表公司送给我一套印有“健力宝”字样的运动衫，并嘱我在方便的条件下，穿着这套运动衫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然后拍张照片寄回广东去。

我当然知道，我熟悉的王书记也罢，我陌生的张经理也罢，他们都出于公心，怀揣着好意，然而，无可讳言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解释，其自身就闪烁着耀眼的光环。这样的职务，不是乌纱帽，却胜似乌纱帽，它的职权，便是你的尊严，它的义务，便是你的荣誉。

我大概明白，我还是从前的我。我珍惜我不曾有过的经历：从重庆到成都的火车，我第一次坐上专列；从成都到北京的航班，我第一次坐上包机；更有那从驻地宾馆到天安门广场，前有警车开道，后有救护车压阵，浩浩荡荡的车队在十里长街上全线绿灯……

呵呵，人民大会堂，我千里迢迢赶来，为的就是直奔你去的。当我拾级而上，登完三十八级台阶的时候，你可否像敞开大门那样敞开你的心扉，告诉你的神圣，连同你的神秘？

2

胸前佩戴着正面印着国徽、镶嵌了照片、填写了姓名和选举

单位、背面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章以及编号的红底白边的出席证，始得在身着便装的门卫的眼皮底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东门。与门外春寒料峭、北风凛冽相反，门内竟是一个热浪蒸腾、人声鼎沸的世界。

宽敞的灯火辉煌的前厅，摆满了供代表们临时饮茶、休息的桌椅。工作人员则穿梭在两三千位代表中间，来回递送着茶水和毛巾。有记者调查过，凡遇大会，由于每个茶杯都要经过清洗、消毒、漂洗三道工序，他们翻腾茶杯就得万次以上，而所提供的茶水，每次需茉莉花茶十公斤，八个锅炉的饮用水，重达二十多吨；前厅南侧的邮电所，也是个人头攒动的所在。代表们在这里争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纪念邮票、首日封，寄给各自的哥兄老伯、至爱亲朋。根据集邮者的说法，这些珍品只有加盖了当日的人民大会堂的邮戳，方才具备真正的收藏价值。有记者调查过，那天短短一小时，三个邮筒里的信件竟然不下八千封之多；当然，足以与人山人海交相辉映的，还是代表们手中各类各型照相机的闪亮登场。富丽堂皇、气象万千的人民大会堂，每个角落都是难忘的画面，鲜艳夺目、晶莹剔透的服饰与首饰，每位少数民族代表都是合影的搭档，于是此起彼伏，于是熙熙攘攘……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近日在《南风窗》杂志上读到的留美学子胡学华给朱镕基总理的一封信。这位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说了下面一段话：“像全国人大，几千人，好像很有代表性，但一年开不了几次会，开会也很难深入研究和解决问题。而像美国的参议院，参议员不过 100 人，每人都配备办公室，有秘书和咨询研究机构，天天开会，研究很多问题，众议员也不过 300 多人”。）

诚然，也许人民大会堂理应成为中国社会的缩影，但是，追星族能够追到人民大会堂里来，却是不曾想到的。这不，那边，福建代表郑美珠被一群代表围着签名，急得她直喊：“让我先把信发出去好不好？”尔后，这位排坛女将鱼跃般地冲出人墙，才把早已捏在手上的首日封投入信箱；这边，安徽代表马兰刚进前厅，就被另一群代表认出来了，“咦，这不是电视连续剧《严凤英》里的严凤英么！”于是请签名，请合影，把这位二十出头的黄梅戏演员折腾得满额大汗……

人民大会堂里的追星族，当然只是近三千人民代表中的一个部分，一个阶层。而另一个部分，另一个阶层，也有所追逐的其他明星，人民大会堂里也能够做到各取所需，应有尽有。前厅中，但凡拥挤处，只要你踮起脚跟伸长颈子往里瞧，保准你可以见到以前只能从报纸和电视上才能见到的人：数学家苏步青，经济学家厉以宁，国画大师关山月，体操王子李宁，香港的实业家霍英东，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宋世雄，以及我们这个行当的重量级人物、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陆文夫……

电铃突然响起来。虽然它不知被安放在前厅的什么位置，但只要它连响三声，人们就会按照它的指挥迅速通过左右两侧依旧站有便装门卫的两个大门，进入人民大会堂里。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座位是固定的，人手一本的报到卡夹内，标志着你的席次与排号。但唯有今天的大会预备会议可以例外，例外到原本应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王震、李鹏等等也坐到台下来了。以后才知道，他们今天的坐法是正确的，因为至少在此刻，大会主席团的名单还没有付诸表决呀。

人民大会堂里的真正的明星应该是政治家。代表们对于政治家的崇拜与追星族对于偶像的崇拜其心理因素是大不相同

的。如果说各种门类的偶像们仅仅有如主席台前沿的鲜花，那么恍若大会堂屋顶那一盏盏明灯的，则是我们当今的政治家无疑了。然而，说来奇怪，只有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台下而没有坐在台上的此刻，我才从眼睛的光芒里而不是头顶的照耀中，看见了政治的大门，正在向人民打开……

主席台上坐着上一届，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他的主持下，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了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团由162人组成：党和国家领导人（含现任与前任者）27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15人，中央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负责人34人，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代表15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代表团负责人32人，而来自基层的企业家、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和知识分子等各界代表人物则多达39人，就是说，在主席团成员比例的分配上，人数最多的不是官员而是老百姓——

这就是那些政治试卷的答案么？我蓦然想起书本上的文字来，诸如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原则，诸如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的政治制度，而直言其事且明确具体的，恐怕就是我国《宪法》中的条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置身在一种由感性到理性再由理性到感性的互换之中，我不觉在心里说，中国的政治已经从教科书上走下来了，伴随着人民代表的步伐，已经走进人民大会堂里。

彭真仍然坐在主席台上。可是当主席团成员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选出本届主席团常务主席万里、习仲勋、乌兰夫等17

人后，他站起身来，以一种肃穆的语气宣布，“主席团常务主席已经推定，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祝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圆满成功！”随即，彭真和不是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成员们开始退场。在会场上再次响起的掌声中，万里同彭真紧紧握手，紧紧拥抱。我坐在主席台下，虽然无法听见此时此刻他们两人各自都说了些什么，但从翌日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他们拥抱时刻的大幅照片看，各自的话题我敢肯定都与中国民主进程的接力棒已由一个历史阶段交接给了另一个历史阶段有关。

现在坐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位置，继续主持着将要通过二十三项会议议程的预备会的是万里。这位当年的安徽省省委书记出现在今天的主席台上，就其新的历史的开篇而言，是颇有象征意义的。《人民日报》记者在一篇题为《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的通讯里写道，“八十年代升腾于中华大地的政治民主意识，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末，古老的黄土地上孕育着的亿万农民的经济民主意识。一位对政治学颇有研究的人大代表说，‘研究中国的民主，不能不从农民追求经济民主破题’。1978年，正当八亿农民在贫困、狭窄的‘胡同’里徘徊，安徽省凤阳县农民为了生存，把田地偷偷地分了。来自安徽省的人大代表回忆起这次举动，津津乐道，‘这可是农民找到的一个能决定自己事情的地盘，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开始自主经营’……”

是的，如果说古老黄土地滋生的经济民主意识，激发了民众对政治民主的追求，那么正是这种追求的结果，城市经济体制也被猛烈地摇撼了。承包、招标、破产、兼并……商品经济中出现的一切，都刺激着人们传统的民主思维定势。“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东北人什么都敢干。”而

过去是不敢的，什么都不敢。在我生活的重庆，以一句“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的口号，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城市经济改革试点。于是西方人士也承认，“在中国，民众已开始具有敢于在政治上直言的开放心理”。

这种开放心理简直如同宇宙一般，无限的时间，无限的空间，就看有什么容器来把它装下了。这样想时，顿觉置身其间的人民大会堂虽大，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过是一座小小的房子。“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中国诗人艾青在他早年的一首诗里的句子了。

3

万里站起身来，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全体起立。奏国歌。在这之前，他宣布了另一件事情：应到代表 2970 人，实到代表 2892 人，符合法定人数。而后，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国务院代总理，行使总理职权。

于是，名正言顺地，李鹏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讲的是普通话，但是明显地夹杂着四川口音。他的报告长达三万多字，足足念了两个半小时。事后，有报纸报导了湖南代表谭志先的“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在作这样长的报告时，李鹏居然一直是站着而不是坐着的；二是想不到来北京前自以为人民大会堂会有专柜，供应一些紧俏货，结果带好了钱却没有东西买。于是这位代表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是个好势头。改革的会议，会议的改革……”

令我想不到的，则是我们四川代表团重庆小组第一次讨论

会上的开场白，竟然同样是这“两个想不到”！首先发言的重庆代表高素芳是位中年妇女，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职业也仅是一名清洁工，但是她以她的诚实与奉献，继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又成为了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高素芳操一口地道的重庆土话，发言说：“你们不要笑话我嘛，我当真是这样想的。我都是老代表了，凡事还不晓得比较么？就拿今年当代表来说，我就觉得比往年光荣。往年是比到箍箍买鸭蛋，根据上头的分配，重庆代表中要有一个工人，而且是女工，还必须是共产党员，这样就把我推荐出来了。可是，今年就不得行了，推荐出来可以，但还作不到数，还要差额选举，只要票数够不到，莫说我们工人，就是当官的也一样要遭选脱……”

“好了，好了，高代表的发言我认为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于汉卿打断高素芳的话，笑容可掬地道。他是天津远郊的人，花白的头发和宽厚的嘴唇愈发显现着北方人憨厚与和蔼的气质，“根据大会秘书处和四川代表团的布置，今天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审议李鹏代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所以，还是请大家在发言的时候书归正传吧。”

于汉卿当过重庆市市长，现在的职务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又是四川代表团重庆小组的召集人，尤以他几十年来从基层开始的勤恳而务实的工作，赢得了人们普遍的信赖与尊敬，所以，他的语言是具有号召力的。

谢太丰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位响应者，这位身材高大的重庆钢铁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声若洪钟地道，“李鹏代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听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印象最深的还是对形势的认识。应该说，中国今天的形势已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新体制，

旧体制；新观念，旧观念。相互摩擦，猛烈撞击。前进中穿插着后退，成功中伴随着失败。改革已由势如破竹的开端进入了今天的相持阶段……我是搞统计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去年统计公报中，透露出一些近几年来首次出现的趋向：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中，伴随着经济效益的相应提高，农村乡镇企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农业产值；国家工业结构中的‘长腿’开始缩短，‘短腿’正在伸长；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而进口势头终被抑制，使全年进出口贸易逆差比上年缩小百分之七十……就是说，我们正在相当多的领域里向既定的改革目标接近。那么，中国的改革会不会搁浅，能不能坚持，我想，这就是本次大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热点与焦点。嗯——”

谢太丰是江苏人，但是他的普通话说说得字正腔圆、滚瓜烂熟，“从报上得知，前几个月，刚刚接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李鹏说，‘我要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把改革推向前进！’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改革的领导者传递给人民的重大信号，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不仅双手赞成改革的势在必行，而且要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加快改革的步伐。老实说，中国既然在战略决策上第一次把自己融入国际经济的循环之中，那么，舍此便别无出路了……”

发言骤然踊跃起来。就其发言自身而言，其实是不用在小组会上号召的。包括我在内，代表们都有一种朴素的心理状态，那就是当代表光荣，到北京光荣，而这种光荣的回报便是发言，便是人人有份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现在发言的是来自重庆近郊的一位农民代表。崭新的咔叽面料的中山服在灯光下的效果，显然增强了他对发言的信心。他是一位养鱼专业户，他的故事便是从承包第一口鱼塘开始的。他讲得很细，列举了只有本村人才熟悉的名字，描绘了只有养鱼者

才知道的细节。虽然坐在后排的大会简报组的工作人员因为不便记录而皱起眉头,但是,他的生动的语言,真实的内心,连同混乱的逻辑和错误的修辞,却引发着本组代表们的笑口常开。重要的是,这位农民代表从他那充满感性色彩的发言中,依然提出了许多理性的问题,诸如农业的增长明显趋缓,农副产品供应全面趋紧,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无章可循,以及最让老百姓不满的物价上涨和部分票证恢复等等。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中年干部。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尤以他那梳理得一丝不乱甚至一尘不染的头发,显露着知识分子的儒雅与尊严。他的发言显然要准确得多。如果按照中学生命题作文的要求,他的准确度可以达到十环。这不,李鹏代总理长长的政府工作报告,现在已被他归纳成短短的几个版块,而每一个版块之中,又被他提炼出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要点。他手里拿着作为大会材料的《政府工作报告》,不少代表随着他的思路,用红颜色的铅笔在自己那份《政府工作报告》上构画着要点。稍有片刻,密密麻麻,翻来覆去,那厚厚一迭的纸张上,竟无页不见红杠杠!对于过去工作的成就,他自然给予了肯定,可是那是李鹏代总理已经肯定了的;对于过去工作的不足,他自然给予了批评,可是那是李鹏代总理已经批评了的。唉唉,作为这位代表的听众,在他的无可挑剔的发言中,我实在分不清楚有哪些语言属于李鹏代总理,又有哪些语言属于自己的?

“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之前,我想回到高素芳代表先前提到但是我以为并没有讲好的一个话题上去——”

语态庄重、坐姿也庄重的重庆大学教授雷亨顺终于发言了。听别的代表介绍,他原本是个沉默寡言、近乎迂腐之人。早不说晚不说,偏偏到了五十年代反右斗争方兴未艾的那个冬天,他打

开了话闸子，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于是继续沉默，继续迂腐，直到贴在嘴上的封条被八十年代的春风席卷而去。都说他敢讲而且善讲，至于敢讲到什么程度，善讲到什么水准，因为素昧平生的缘故，今日始得亲眼目睹。

“这个话题就是差额选举。差额选举在中国的出现，我认为不只是方式的更换，从本质意义上讲，它孕育了中国新一代人民代表和他们的选民。过去的选民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选举，也就成了皇帝的新衣式的闹剧与悲剧。而只有更多地体现着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的选举，选民才算获得了起码的民主的权利。当然，当选的代表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人，但一个臭名昭著的人是无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多数选票的。那么，像我们这样当了代表的人，又该如何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呢？刚才听到不少代表一口一个‘学习了李鹏代总理的工作报告’，什么叫‘学习’？要‘学习’你回家去‘学习’，现在是审议李鹏代总理的工作报告，未经审议，这个工作报告还不能发表呢！所以我要说，审议，评头论足，说长道短，就是代表们必须行使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你的选民给你的。以重庆为例，现在全市有 1500 万人，代表还不到 40 个，每一个代表的身后都有着 40 万人，代表们呀，那是 40 万双眼巴巴的目光，40 万个翘首以待的希望呀，若是你光晓得举手，光晓得说好话，你对得起生你养你还要选你的老百姓么……”

雷亨顺有些动情了。虽然四川话在表达情绪的时候比不上普通话的抑扬顿挫、慷慨激昂，但是，从他不苟言笑的表情与斩钉截铁的手势里面，我似乎领悟到了关于代表参政议政、关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刻的内涵与底蕴。

我从小组会上回到房间的时候，正碰见同房间的钟鑫圆在接待他的客人。钟鑫圆是重庆特殊钢厂的高级工程师，他的客人我上次见过，是海军系统的兵工专家，也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上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人正在谈某种钢材的性能问题，而且有好几堆图纸，半卷着摊在我的床头。我知道那是我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于是知趣地退出房间，上街蹒跚去了。

今日见面，未待听清楚他们在谈些什么之前，我更需要扭头便走。因为上次客人穿的是便服，我一时还不明白事理，而这次客人着军装，那顶大盖帽，那身藏青色将军呢制服，直接让我感受到了这个房间是机密所在，正可谓“军事重地，闲人莫入”矣。

然而，我被这位海军代表叫住了：“没有事的，没有事的。我们住的宾馆与你们国务院招待所隔得不远，所以过来看看。如果方便的话，还想听听你这位作家对我们军队建设的意见呢。”他显然是真诚的。因为这时放在我的床头上的，是他刚从他们的小组会上领到手的三份《代表议案》和六份《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表格。

“不敢、不敢。”我道出了自己的卑微，“你不知道，钟代表晓得，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只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啊！”

“无党派人士又怎么啦？无党派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党派。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邓颖超大姐说的。当年的郭沫若先生、马寅初先生，不正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么？据我所知，李宗仁先生和程思远先生从海外回来的时候，